

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历史变迁

李艳枝*

2007年10月17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政府提交的动议,授权政府采取越境军事行动打击盘踞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使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作为困扰土耳其的一个世纪难题,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一党制时期库尔德人为争取宗教和民族权益的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的分割占领导致这个庞大的多民族帝国分崩离析。根据1920年奥斯曼苏丹与协约国签订的《色佛尔条约》,欧洲列强援引所谓的民族自决原则试图在库尔德人聚居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家,但由于该条约从未付诸实施、库尔德人内部的四分五裂和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并未建立起来,库尔德人随后被人为分散在毗邻的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其中土耳其人数最多,构成土国内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

在土耳其独立运动期间,凯末尔领导的独立战争曾得到库尔德人的热情支持,因而在1920年4月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中,库尔德人在377个议席中占了72席。^①但是当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以凯末尔为首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对库尔德人的态度和政策发生改变。1922年11月,凯末尔在议会宣布:“新国家是土耳其民族国家。”^②1923年《洛桑条约》中规定只有非穆斯林如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属于土耳其的少数民族,这就否定了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地位。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宣布为共和国,确立了世俗主义的发展方向,并强制推行“民族同化”。1924年宪法明确否认库尔德人独立的、合法的民族地位,并称他们为“山地

土耳其人”,并严格禁止公民使用库尔德语。这些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下的民族同化政策否定了独立的库尔德民族的存在,对库尔德人的民族意识造成严重伤害。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凯末尔主义旨在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和世俗社会,因而以土耳其民族主义为纽带而淡化伊斯兰教认同的政策导致库尔德人的离心倾向增强。1925年爆发了谢赫·赛义德领导的库尔德人武装反抗中央政权的起义,这是库尔德人首次为了捍卫宗教权益和哈里发地位而进行的斗争。1926—1929年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向纵深发展,赋予妇女平等权利、废除多妻制、在宪法中取消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推行将东部库尔德人强行迁移到西部的移民法,从而酿成了1930年的暴力反抗运动,起义者在阿勒山区宣布阿勒为“库尔德斯坦的一个独立省”。^③1930年以后库尔德语被正式禁止使用,强行迁移变得合法化;1934年明确规定除教职人员外土耳其公民不准在公开场合穿着宗教服饰。库尔德人在1938年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反抗。土耳其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的镇压使得库尔德人带有宗教和民族特点的暴力反抗成为早期的主要斗争形式,但这些暴力反抗是小规模的、分散的、偶发的暴力行为。随后,库尔德人居住的省份成为诱发反对世俗化改革和国家政策的温床,这些叛乱强化了土耳其官僚阶层对库尔德人和库尔德问题的记忆,库尔德问题也成为土耳其历届政府关注的焦点。

*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① 转引自唐裕生:“库尔德人问题的发展历程与前景”,《世界民族》,1998年第1期,第39页。

② Gerard Chaliand, *The Kurdish Tragedy*, London & New Jersey, 1994, p. 29.

③ 同注①。

多党民主制启动后库尔德人的分化与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启动多党民主化进程,凯末尔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地位被相对削弱。1950年,民主党组成土耳其第一届民选政府,为笼络人心和巩固权力,民主党逐步放松对政党、言论和宗教方面的严格控制,凯末尔时期受到压制的各种社会思想和社会力量迅速复活且急剧膨胀,并从不同角度对土耳其的社会、政治施加影响,使库尔德人形成三个不同的利益实体:库尔德世俗民族主义者、政治框架内的库尔德人和穆斯林库尔德人。库尔德世俗民族主义者充分利用渐趋缓和的政治气候和激烈的党派斗争,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他们与其他政治势力一道抨击凯末尔时期的各项政策,出版秘密刊物,谴责政府对库尔德人的同化政策,宣扬库尔德民族的历史、语言和文化,从民族学和人类学角度论证库尔德人是一个具有独立属性的古老民族,鼓动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情绪。^① 政治框架内的库尔德人则是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城市化进程中被整合进土耳其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内库尔德经济和政治精英。他们认为在民主化的社会背景下,库尔德与土耳其之间的民族冲突已经失去动力,主张通过同化于土耳其共和国和利用左右翼政党之间的竞争发挥影响力,试图通过获得在议会的代表权来提高库尔德人的社会地位。由于在商界和政界较为活跃,这些库尔德人通常居住在土耳其西部的大城市。穆斯林库尔德人强调伊斯兰价值,认同宗教而非种族,但在民族认同方面,坚持库尔德民族主义,否认土耳其共和国的世俗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原则。这部分库尔德人主要来自土耳其的纳格什班迪教团和努尔库运动,他们和土耳其的伊斯兰团体一起反对凯末尔主义,^② 在左右翼激烈斗争的年代支持民族党或伊斯兰政党。

从20世纪60年代起,土耳其政府推行“更名换姓”的同化政策,强行把库尔德语的人名和地名换成土耳其语,规定新生儿一律用土耳其语命名。1961年当选的土耳其总统古勒苏尔强调指出:“在世界任何国家里都不存在被称为库尔德的民族。”土

耳其总理埃里姆也声称:“我们不承认土耳其国内有其他民族存在,在这个国家里只有土耳其人。”^③ 在这样的背景下,库尔德人在教育、服兵役和工作等方面遭受歧视。1974年,邻国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武装斗争赢得了半自治的权利,这鼓舞了土耳其库尔德人谋取自治的武装斗争。这一时期,土耳其由于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模式的固有弊端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现象严重;政治上联合政府更迭频繁,政党活动空间增大;国际上,两极格局的冷战和争霸进入新阶段,西方左翼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因此,土耳其国内左翼思想迅速传播,共和人民党政治立场转向中左以赢取民众支持,库尔德人中的世俗民族主义者也在这里找到了理论指导,于是持有不同政见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秘密组织纷纷建立。1971年,一些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以合法刊物《自由之路》为掩护,秘密成立“土耳其库尔德斯坦社会主义党”,并建立了党的外围青年组织“人民革命文化联合会”。该党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主张以非暴力方式建立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的社会主义联邦国家;主张奉行亲苏政策,组成反帝联合阵线,向社会主义阵营靠拢。^④ 随后土耳其又出现很多类似的库尔德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这一时期世俗的民族主义者普遍采用激进的左翼思想,有组织、有纲领地谋求实现库尔德斯坦的自治或独立,这就为库尔德工人党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库尔德工人党的反政府行动

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混乱的政治经济形势和严酷的暴力斗争促使以凯末尔主义捍卫者自居的军方于1980年发动军事政变,以恢复和平、秩序与稳定。但对库尔德人地位的继续否认和政策上的限制促使库尔德人的暴力反抗斗争发展到新阶段,这主要表现为库尔德工人党的反政府行动。

1978年11月,阿卜杜拉·奥贾兰创立库尔德斯

^① See Konrad Hirschler, “Defining the Nation: Kurdish Historiography in Turkey in the 1990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7, July 2001, p. 150.

^② See Fulya Alacan, “A Kurdish Islamist Group in Modern Turkey: Shifting Identit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July 2001, pp. 111–144.

^③ 转引自唐裕生,“库尔德人问题的发展历程与前景”,《世界民族》,1998年第1期,第40页。

^④ See Gerard Chaliand, *The Kurdish Tragedy*, p. 46.

坦工人党;主张通过暴力斗争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交界处成立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库尔德斯坦共和国”,“斗争的最可靠手段建立在广泛的暴力基础之上”。^①1982年,该党代表大会决定采用恐怖手段,打击土耳其政府和亲政府的库尔德人。1983年,库尔德工人党与巴尔扎尼领导的伊拉克反政府武装库尔德民主党结成同盟,并在伊北部地区建立训练营地。1984年,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东南各省发动大规模游击战,袭击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和亲政府的库尔德人。但库尔德工人党攻击平民伤及无辜的行为引起人们强烈反感,一些库尔德民族主义组织主动与其划清界线,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宣布中止同库尔德工人党的合作。1988年6月23日,由八个派别组成的“库尔德运动阵线”发表声明:反对恐怖主义,共同抵制库尔德工人党,该阵线还积极协助土耳其警方成功逮捕该党地方组织数名重要领导人。在各方压力之下,库尔德工人党决定暂时放弃恐怖活动,把注意力转向进攻土耳其境内的经济目标。1989年5月,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首次袭击并占领了锡尔特省煤矿,在矿区进行反政府宣传和扩充兵员。同时,库尔德工人党努力寻找新的合作伙伴,积极发展同伊拉克库尔德爱国联盟的关系,注意拉拢一些小的土耳其左派组织,如“革命左翼”、“土耳其马列主义共产党”等,不断扩大在城市中的影响。海湾战争的爆发为库尔德工人党带来了机会,库尔德工人党借助伊拉克北部兵力空虚的有利形势在伊土边境自由活动,从难民中招募人员,搜购武器弹药,军事作战能力明显增强。随之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与政府军的对抗日趋激烈,在土耳其东南各省,库尔德游击队加紧对城镇和村庄的争夺与控制,不断袭击政府机构,鼓动库尔德居民罢市、静坐,开展与政府不合作运动,游击队还经常对学校 and 教师发动袭击,构成对社会治安和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

面对库尔德工人党咄咄逼人的攻势,土耳其政府采取了军事打击和内部分化的措施来削弱库尔德工人党。土耳其政府军不断出击,清剿游击队,并在伊拉克的默许下派地面部队和空军多次进入伊拉克北部摧毁库尔德人工人党的训练营地。土政府还积

极拉拢库尔德上层分子,利用其影响削弱库尔德工人党的社会基础。1991年,总统厄扎尔宣布废除对库尔德语的禁令,总理德米雷尔也表示“土耳其承认库尔德民族的存在”,以此缓和库尔德人的反政府情绪,孤立激进的库尔德工人党;土耳其当局还将山区库尔德居民强行迁移到平原地区或城市居住,彻底断绝游击队与库尔德居民之间的联系,切断游击队的兵员和粮食来源。因而到90年代中后期库尔德工人党出现粮食不足,医药匮乏和兵力锐减的局面,不得不公开承认遇到了巨大困难。^②随后库尔德工人党及其武装转攻为守,走向衰退。尽管奥贾兰对外宣布放弃独立主张,发出停火号召和实施单方面停火,土军方仍然于1995年3月20日出动大约3.5万人的军队,深入伊拉克北部境内40公里,向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的武装据点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严重削弱了库尔德工人党力量。1999年2月,土耳其特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将奥贾兰抓获并押解回国,这标志着军方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的巨大胜利。同年8月2日,奥贾兰呼吁同党无条件停止武装斗争,库尔德工人党领导层和武装分子纷纷放下武器向政府投诚,随后残余武装也陆续撤出土耳其,使土耳其国内的分裂势力丧失暴力基础,至此,土耳其长达15年的反分离主义斗争告一段落。库尔德工人党的暴力行动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促进了部分库尔德人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另一方面也使厌恶暴力斗争的库尔德人反对库尔德民族主义,强化了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寻求相应政治权利的努力。2002年,库尔德工人党残余力量更名为“库尔德自由民主大会”,宣布“武装斗争已经结束”,这实际上标志着库尔德工人党的暴力行动已经暂告失败。^③

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库尔德人 政治诉求的改变

正义与发展党在其上台前的2002年大选中,强

^① Paul J. White and William S. Logan, eds., *Remaking the Middle East*, Oxford; New York: Berg, 1997, p. 227.

^② Ibid, p. 246.

^③ 郝时远:“民族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第5页。

调反对军方在库尔德地区所采取的政策。宣称,“我们和你们库尔德人一样,深受凯末尔主义指导下的国家及军方之害,如能上台执政,我们首要的是调整凯末尔主义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①极力表现出其是一个关注库尔德人问题的政党,因而在库尔德人地区获得相当多的支持,尤其是得到那些深受纳格什班迪教团和葛兰运动影响的库尔德人的积极支持。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利用库尔德问题作为反对世俗主义军方的主要借口,宣称:世俗主义是导致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分裂的原因,库尔德问题是由凯末尔主义所推行的世俗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造成的,因而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库尔德工人党是一个被军方夸大的事实,一些人甚至私下声称军方之所以保持冲突的继续存在是为了维持他们在土耳其政治中的角色和地位;1997年军方迫使繁荣党政府下台的软政变造成库尔德工人党疏远了政府,所以库尔德问题的现实局面部分是由军方造成的,因而解决的有效方法是淡化民族主义色彩而强调穆斯林的兄弟情意。所以,正义与发展党提出“伊斯兰教是粘合剂”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强调共同的伊斯兰纽带和兄弟情意就能提高国家的统一性和制止冲突”。^②在这样的背景下,库尔德工人党的政治立场也发生变化,其最初是将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库尔德民主共和国作为政治诉求,现在则倾向于建立一个土耳其—库尔德双重民族属性的国家,从与政府的直接冲突转为要求修改宪法以使土耳其共和国的社会基础发生变化。这种政策试图利用土耳其政治民主化来增加库尔德人在社会层面的支持和认同。库尔德人还极力寻求作为国家公民的地位,因为在他们看来,少数民族地位虽然保证了民主权利,但在某种程度上遭受了土耳其主体民族的歧视,这意味着其要争取与土耳其人一样的平等公民权利。

但是正义与发展党在解决库尔德问题时面临许多问题:一是埃尔多安总理对库尔德问题的看法与库尔德人自己特别是库尔德工人党大相径庭;二是正义与发展党的政策与其他国家机构尤其是军方之间存在巨大的冲突;三是正义与发展党反对降低政党加入议会的10%的门槛,因为他不希望较小政党获得代表权,以分散土耳其政治的集中性;四是对库

尔德工人党实行大赦也在其社会基础中得不到回应,这就决定了其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有限性。随着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主义在2005年再次兴起,埃尔多安主张重新界定土耳其民族认同,将土耳其公民的概念作为土耳其的认同基础,这是对历史上否定土耳其库尔德民族存在的一个纠正。在2005年8月的一个正式的官方报告中,正义与发展党公开承认库尔德问题的存在,认为公民身份而非土耳其民族认同应该是维系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的纽带,认为给予平等的公民权是解决当前问题的主要途径。几天后,当他到迪亚尔拜克尔(Diyarbakir)这个土耳其最大的库尔德城市时,强调了土耳其国家的统一性和单一的民族感情及历史归属。^③虽然他继续强调穆斯林的兄弟情意来解决库尔德问题,但是该行为遭到其他国家机构和反对党的否定,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库尔德人问题、波斯尼亚问题、阿尔巴尼亚问题和车臣问题视为民族国家实体下的亚民族认同的矛盾,认为其是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的主要力量。所以军方与正义与发展党在库尔德问题上的态度分歧制约了后者在库尔德问题上的解决,这就为库尔德工人党的暴力升级提供了口实。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自治地位的确立和在国家政权获得主导地位也对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政治斗争产生很大刺激,所以从2006年开始,库尔德工人党将攻击目标扩展到所有的土耳其人身上,以激化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矛盾。库尔德工人党还采取新的斗争策略:攻击军方目标、在路上埋地雷、进行自杀式炸弹袭击,所以土耳其安全部队在安那托利亚库尔德工人党控制区遭受重创。土耳其将军委员会主席希米·欧兹科克(Hilmi Ozkok)公开号召国家采取必要的法律程序来瓦解和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内部的活动。随着库尔德工人党恐怖行动的升级和军方的努力,正义与发展党于2007年10月获得议会通过的允许越境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的授权。◎

① M. Hakan Yavuz and Nihat Ali Ozan, “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urkey’s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III, No. 1, Spring 2006, P. 109.

② 同注①, p. 110.

③ 同注①, p. 111.